



#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 中国案例研究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Case Studies from China

著

曹 晋 文森特·莫斯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上海市高峰学科新媒体研究课题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新闻传播研究方向”系列成果（编号：SXH3353017/007/026）



#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 中国案例研究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Case Studies from China

著

曹晋 艾森特·莫斯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 / 曹晋, (美) 文森特·莫斯可著; 曹晋, 徐璐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675-7399-4

I. ①传… II. ①曹… ②文… ③徐… III. ①传播学—政治经济学②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G206②F0③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6652号

##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

著者 曹晋 文森特·莫斯可  
责任编辑 范耀华  
审读编辑 虞怡然 何怡  
责任校对 陈易  
装帧设计 俞越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6开  
印张 16.25  
字数 335千字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5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7399-4/G·10889  
定价 42.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 序言

笔者自2005年赴美完成耶鲁大学东亚委员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伊始,和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 Vincent Mosco 教授已经有十余年的学术情谊,彼此合作教学、联袂出版的默契都写入每年暑假举办的“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学术研究营”和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支持的国际 FIST 课程。他和 Graham Murdock 教授不顾上海的酷暑炎热与连续授课的疲惫,总是面带慈祥的微笑。两位老前辈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人都表现出无比的关怀,对于尚待理解的新媒体传播现象表现出好奇的警觉,因为这一切颠覆着资本的秩序、规划和表面的和谐。全球都在讨论大数据的商业价值,企业都在追逐大数据所创造的财富,个体都通过大数据获取便利,但罕有学者反思大数据对主体隐私的监控、滥用,或者探索大数据重构的霸权体系。Vincent Mosco 和 Graham Murdock 教授每次跨越千山万水而来,都表现出他们对上述问题的敏锐感知,激发了笔者对新媒体宰制日常生活的批判。无论是会面畅谈,或是会议交流,或是联合教学,这两位望重士林的老前辈不仅使我们的学生受益于他们的学术洞见,而且使我们的学术团队也因他们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而备受激励。他们每年带来西方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笔者开设的本科课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尤为有益。2016年春季,笔者在美国接到 985 基地主任童兵教授的贺喜,他祝贺“传播政治经济学”获得学校精品课程;2016年秋季学期,Vincent Mosco 教授唯一的中国籍学生姚建华博士加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Vincent Mosco 和 Graham Murdock 教授十多年来的激励甚为深切,晚辈的确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此,笔者想说:你们鼓舞了我,我才能超越自己!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最令人快慰的是我们彼此的学术合作不断推陈出新,继笔者与 Graham Murdock 教授合作《新媒体、社会性别、市场经济与都市交往实践》(2015),以及笔者与 Vincent Mosco 教授联合主编 *Critical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14) 英文读本之后,各种因缘际会又激发笔者与 Vincent Mosco 教授联袂出版《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论著,该书凝聚了我们长期合作的汗水。Vincent Mosco 教授自始至终坚持批判的现实主义理念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学理,笔者则聚焦中国大陆的本土问题,不断强调理论和经验性、解释性实践的关系是多重决定与相互建构的。本论著致力于提炼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西方学理,在 Vincent Mosco 教授的理论探讨的基础上,笔者补充了“网络空间的商品化”、“结构主义”、“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以及“数字民

族志：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路径”等章节，并以本土具体的案例研究为依据从两种路径丰富并精致化了中国的批判传播理论：其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研究(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Gender Studies)的结合；其二是敏锐洞察都市知识劳工的工作与生存的不确定性( precariousness)，表达出深切的社会关怀。知识劳工作为社会地位下滑的阶层，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而陷入绝对贫困，而是因为从生产型社会转为消费型社会的当下，知识劳工缺乏消费能力而成为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工作的穷人的相对贫困令他们在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的深广推进中倍感挫败和沮丧。笔者关注知识劳工的困境，在具体研究方法的探索中，主张不是为方法而方法，而是带着学术训练的人性意涵和人文关怀来讨论一种体察传播政治经济学逻辑话语中的中国本土经验社会的认识路径，以质的分析阐释传播议题与社会变迁的意涵。

在笔者所有中国案例的研究时段中，传播新科技的日新月异已经激发国际学界热烈讨论信息社会的各类面向，如哈佛大学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Yochai Benkler 在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论著《国家福利：社会生产如何转变市场与自由》中提出新媒体技术引发的社会生产，也就是“同济生产”(peer production)，即通过个人自愿地贡献其专业技术建立的一个网络，没有利润诉求，以无偿劳动来提供文化和知识的社会再生产。这种自主性地创造社会分享、也创造信息商品和服务的工作，这本该由公司进行补偿的劳动，却由自发的同济生产满足了商业的需要，遮蔽了劳资剥削关系。因兴趣组合的字幕小组的弹性劳动和杜蕾斯网站动员起来的粉丝劳动都属于同济生产的社会分享。可见，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没有因为新技术的普及和更新而消亡，反而更加隐蔽和深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新科技就未必能被乐观预期为戴尔·威瑟福特(1999)在《赛博马克思》中所论述的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方式。笔者以为资本主义剥夺的固有属性不曾改变，又如何可以预言新媒体能够削弱资本主义的根基？当下资本主义借助传播新科技克服各种空间障碍进行全球扩张，正是技术力量令其如虎添翼。

Mandel(1999: 196~198)敏锐地发现计算机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实际上强化了资本积累的矛盾，该矛盾通过对于全球经济各中心国家的债务——金融消费而言必不可少的信贷扩张来解决。在这些国家里，基础设施和流动资金的存在意欲容纳疯狂的消费。而在中国由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的当下进程中，“第三次技术革命”并没有让勤勉工作对职志的稳定且持久的社会认同继续发挥作用，劳动和有尊严地生存已经失去逻辑关联，劳动所得的工资在一、二线城市持续飙升的房价面前和消费基本必需的住宅商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消费主义文化渴望培育有“区辨能力的消费者迷思，以及市场作为自由选择的供应商暨自由偏好的捍卫者的迷思，两者相互滋养陶冶。……正确的消费者类型，应该是珍爱选择的权利，胜过所选择之对象，并且赞扬接触市场的权利，视之为鉴赏品味的公共展示”(包曼，2006 中文版：79)，而中国本土与西方合作的男性时尚杂志就是这一趋势的侧影。与消费主义并行的残酷现实是所有劳动力包袱都抛向市

场,对住宅、医疗、教育采取去福利化的举措,其实质是对知识劳工设计的去权力化的陷阱。我们透过知识劳工的案例研究,就可以明白知识劳工的获得感不可能建立在“超越福利国家的愿景”(包曼,2006 中文版:63)之上,知识劳工市场仍然被主流生产方式的社会权力关系所主宰,更不要指望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拯救中国的知识劳工了。学者已经得出睿智的结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把劳工释放到全球市场的结果就是:加倍的世界劳工已经带来了工资急剧下滑的压力”(Freeman,2006)。加拉格尔所著的《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一语中的,她认为中国大陆奉行的是“一种通过国家主导发展和国家控制社会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2010:8)。台湾学者对全球化背景中的亚洲劳工的分析十分地道,“资本成功地占据了重整的利益,通过将劳工控制市场化,将劳动阶级的结构拆解掉,重建了有利于资方的劳资关系”(张大业,2010:75)。知识经济时代依然由发达国家控制着知识的全球传播,免费的国际分享实属徒劳的梦想,诚如笔者对版权的讨论,知识产权作为资本积累的正当性工具,捍卫其权威的国际条约和法规恰恰有力地维护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家 Peter Golding 和 Graham Murdock 长期合作,在 2016 年第 7 期《新闻记者》发表的访谈文章中,Golding 教授特别强调如果深层次的社会财富和分配的权力结构不改变,信息社会的社交媒体无论多么繁荣,那都只是交往和传播方式的变化,而不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如今数字鸿沟还在加剧,因此,必须持续关注媒体和传播如何关联社会不平等。在笔者看来,新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的确提高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但塑造等级结构的权力关系依然牢固,甚至不可撼动,我们仍难以乐观预测由新媒体推进所引发的新的生产方式能够改变不平等社会。Christine Fuchs(2015)也论述了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和经济如何充满对数字劳工权利的剥夺,如 Dean Colby 所言:“新经济中的新生产方式将会至少利用新媒体的生产力量来改变资本主义方式特有的社会关系。这些包括工资契约化和生活空前绝后的商品化,以及过度积累、失业、长期通货膨胀和军国主义等由商业循环所导致的发展矛盾。进一步说,新生产方式究竟如何,我们必须从其自身是否削弱了诸如社会性别化的、种族化的和等级化的‘人类时尚’的负面作用及削弱程度来评价。”(Dean Colby,2007:194)在此,笔者十分认同 Frank Webster 在其《信息社会理论》中阐述的论点,传播新科技推动的信息社会并非新型社会,不过是剥夺属性依然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本论著选取了笔者领衔探索的八个聚焦于中国本土的案例研究,以此对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这些案例既是全球信息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模式的侧影,也是中国传播新科技与市场经济、行政权力相互交织而营造出的正在生成的知识劳工的社会情境。我们以本土案例研究来参与全球学术对话,许多学者都在探索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民工和国企工人的境遇,笔者则聚焦于正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庞大的知识劳工群体,也就是涵括了参与到知识产品生产和分配链条中的所

有劳工(Mosco & Mckercher, 2008)。他们正处于被技术和市场经济转型迷思化的语境中,内部等级因行政权力的介入而严重分化,办公室的普通知识劳工其实没有从市场经济的营收中分享到红利。弹性雇佣制度、苛刻的绩效考核与收紧的意识形态管制、强制性的市场经济逻辑、消费社会的标准等多重宰制力量贬损着知识劳工的劳动力价值,其社会地位下滑的必然性消解了知识劳工对未来的憧憬。

曹晋与张楠华合作的《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一文通过以民族志参与观察中国大陆网络字幕组的研究路径,分析字幕组工作人员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聚集于网络文化的信息生产。研究发现,传播技术以给予“自由”的方式索要人们的精力和时间,娱乐兴趣与网络劳动工作的界限趋于模糊,信息社会知识劳工的弹性兴趣劳动与传播新技术成为“发展的信息化模式”的生产力源泉,资本主义的弹性经济积累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剥夺更具隐蔽性。

曹晋与曹茂合作的《“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一文论述“新闻民工”修辞的生成语境。“新闻民工”作为业界记者的自嘲或是调侃自身地位下滑的口头言语一度流行开来,继而成为转型中的中国一种新型的身份概念。此一修辞是对新闻工作者在强制性的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从文化事业身份转型为全职临时工(或者说是游移民工)身份的经典隐喻,前者处于充分享受国家住房、医疗、教育等配置型福利和社会资本的优势状态,而后者无论是福利、资源,还是职业前景都完全处于不确定性状态(*precariousness*)。这意味着纳入媒体改革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并非是从传统媒体的僵化体制中获得解放意涵的劳动主体。本论题试图结合长期民族志的素材积累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阐释来考察“新闻民工”修辞诞生的政治经济语境。

曹晋所著《知识女工与中国大陆出版集团的弹性雇佣制度改革》(《传播与社会学刊》,2012年第4期)一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以及研究者在出版业界的民族志观察积累的研究方法,透过中国大陆市场经济图景中的知识女工(女编辑)的劳动被纳入现代化的文化生产市场,却因出版集团化改革和国家去福利化所重构的等级制度令其劳动力贬值,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从低薪、缺乏安全感、不受保护的生存状况,来讨论知识女工的弱势地位如何遭受弹性雇佣和社会性别的制度宰制,以期从多重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压制与国家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构连(*articulation*),来深度理解转型中的中国的知识女工问题。

曹晋与许秀云合作的《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新闻大学》,2014年第1期)一文探索传播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如何重新定义了信息社会的传播劳动力价值和劳工的阶级地位。福利国家时代盛行的福特主义向市场经济国家时代中深具弹性的后福特主义转变,弹性雇佣制度取代了终身雇佣制度,社会保障网络已随市场经济的深化而彻底瓦解,知识劳工的安全感和稳定性逐步消失,转型中的中国也不能幸免于此——全球性

资本逻辑的渗透。本文采用民族志实地调查与问卷统计的研究路径,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理论,以上海某综合性网站为例,聚焦典型的因市场经济和传播新科技而应运而生的网络编辑群体。作为网络知识劳工的一种类型,网络编辑在转型中的中国遭遇了宏观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尤其是房地产的彻底商品化)、弹性雇佣、强制性消费主义等制度权力的剥夺与宰制。从其生活境遇和工作环境的劣势中,透视出那些笼罩在传播新科技和文化创意经济“光环”下的都市网络知识劳工正逐步陷入无产化、贫困化的困境。

曹晋和杨琪合著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论〈版权文化——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编辑学刊》2009年第3期)一文,讨论了本土为数甚多的版权研究中,许多学者潜意识地认同并完全接受了西方世界有关版权的预设与认知,因为他们和西方的理念一致认为版权保护是捍卫知识产品创造者的利益,主观愿望是期望版权的完善以切实保护知识产品创造者的利益和积极性。可见,西方世界有关版权知识的建构,已经被推广为全世界一种普适性的常识和标准。清华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美国学者罗纳德·V. 贝蒂格(Ronald V. Bettig)教授的奠基之作——《版权文化——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该书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主张版权不再是保护知识产品创造者利益和积极性的有效工具,它诞生的主要目的是为资本家攫取更多的利润保驾护航。

曹晋和赵潇爽合著的《男性时尚杂志与后殖民国家西方资本的扩张》(《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5期)一文,运用传播民族志的方法将中国与美国顶级时尚杂志 *Esquire* 进行版权合作的男性时尚杂志《时尚先生》作为研究市场经济全球化语境中本土媒介的经典个案,结合批判取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洞察中国男性时尚杂志的商品化运作过程及其蕴藏的依附经济模式,探索后殖民国家的男性时尚媒介在版权贸易和品牌广告的掌控下,如何重构中国的男性气质、阶级与商品的图貌,从而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维护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梅文宇硕士《转型中的中国“苹果迷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毕业论文聚焦“苹果迷思”,作为一个结合了各种因素的媒介景观,它既是高科技、信息技术生产与消费的典型代表形式,又是资本霸权和文化霸权的重要表现形态,不失为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案例。本研究引入巴特的迷思(神话)概念,但不仅仅局限于广告媒介再现的符号学分析,而是将政治经济物质进程带回迷思分析中心,从媒介再现、宗教式的传播体系以及消费者的研究出发,揭示迷思背后所遮蔽的社会问题,分析迷思制造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演变。该研究发现,通过广告、新品发布会以及新闻报道,媒介将苹果电子产品呈现为一种现代神话。这个神话的塑造,还得益于粉丝的参与推广,作为围墙内的抵抗者,他们并不能逃脱被收编的命运。他们既是迷思的主体,同时又是迷思的制造者。在转型中的中国的特殊语境下,中国的社会转型与跨国资本全球扩张的成功对接成为“苹果迷思”的温床。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跨国资本、国内资本以及国家权力的不



同诉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特殊的社会语境。跨国公司对中国工人和消费者实行的区别对待成为光鲜神话所遮蔽的社会问题。

博士候选人黄炎宁所著的《中国社交媒体企业营销中的用户劳动和消费主义主体建构: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账号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016年第37期)一文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微博”为例,旨在通过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路径的兼容并蓄,揭示大陆社交媒体企业营销过程中的用户劳动现象及其与消费主义主体建构方式的构连。本研究以量化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透视出媒体用户的劳动兼具“自由”和“免费”的特征:由于技术的便利,他们在媒体消费场域为自身创造意义的同时,亦为平台提供商和企业微博分别创造不同程度的价值。而且,当下转型中的中国单一的经济诉求和复杂的媒体图景所日益形塑的消费主义主体建构方式,是众多社交媒体用户从事数字劳动的重要动因,并使其具有了一定的强制性。

本论著的完成,刻印着刚从伦敦政经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的徐璐同学的辛苦足迹,她以绝对优异的成绩考取笔者2017年度的博士,并且作为助教协助笔者录制了两门慕课,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文本是本论著的起点。我们一起讨论框架,共同翻译 Vincent Mosco 教授的理论章节并和孔宇博士共同写作数字民族志等内容,在樱花烂漫的春季又一起履行见面课的职责。我们常常因为发现一个运用了交叉分析模式的英文研究案例而激动,或者因分享某篇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专题论文而引发彼此在形而下的传播新科技支配的社交图景中,同时产生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冲动。弟子黄炎宁同学正在伦敦政经学院写作博士论文,本论著收录了笔者指导该生完成的硕士论文《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和数字劳动》,期待他学成归来,发挥西方学理素养,深刻剖析本土的政经议题。笔者的另一硕士生梅文字同学,其硕士论文选题前沿,论述尤其针对转型中的中国的新科技普及与市场深化的本土情境,论著也收录其压缩后的硕士论文作为讨论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案例研究。另外,笔者要特别向参与专题研究的已经毕业的硕士弟子致谢,她们是张楠华、许秀云、杨琪、赵潇爽等。最后,笔者感谢硕士弟子王丹同学和新入门的博士生郑春风同学的细致审校,两位文字功底扎实的新同门的慧眼审读与纠错保证了本论著的修辞品质。

本论著的两位著作者,也是“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学术研究营”的联合主席。此外特别要鸣谢朴实无私、高效团结的爱徒杨海鹰、徐婧、陆新蕾、秦朝森、蔡润芳、孔宇、徐偲骞、庄乾伟、陈婉琳、董蕾、金鹭、孙景涛、张玥焯、李雪、范紫琦、李兆卿、刘琛、郑薛飞腾、赵恩澈等,他们每天的辛勤劳动,保证了学术营和国际 FIST 课程的正常运转,他们的挑灯夜战,保证了每天学术资料的快速上传。尤为荣幸的是,我们的团队还有翻译水平炉火纯青的翻译专家加盟,林曦、姚建华、王黔、黄炎宁等的卓越表现架起了理解艰深英文论述的桥梁,他们将是未来学界的旗手,再次向他们的高水准课程翻译致谢!

2005年笔者在耶鲁大学研究期间,在Sterling图书馆发现Vincent Mosco教授的英文论著《传播政治经济学》,连续数日沉浸在获得阅读共鸣的狂喜之中,苦苦寻觅的跨学科研究路径豁然眼前,从人文学科进入新闻学院任教的迷茫荡然无存,将政经学理和已经积累十余年的社会性别理论结合,这是多么深刻的分析视角,多重权力的交叉分析在再现社会主体的同时遭受多重权力压制的图景立即了然于胸。Vincent Mosco教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专著实乃笔者从事传播学研究以来深受启发的理论力作,他耗时十年写就的论著全面勾勒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理的西方景观。后来也不断有政经议题的著作问世,如Robert Babe(2009)的《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但后者学理的讨论明显缺少Vincent Mosco教授那种原创性的传播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阐述。笔者在耶鲁访问期间的收获之一便是此论著启蒙我融会贯通了政经与社会性别理论的跨学科阐释。那时女儿才半岁,等笔者结束访问研究回到上海,女儿已经牙牙学语并且会走路了。人生苦短,岁月荏苒,女儿每年作为学术研究营的志愿者,从两位爷爷那里学习到了许多英文学术名词和追求社会平等的思想,她和两位长期合作的老前辈已经缔结深厚的忘年交情谊。2015—2016年,12岁的女儿又跟随笔者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完成富布莱特项目的研究。笔者在2015年冬季前往加州圣地亚哥演讲期间,幸遇Vincent Mosco教授和其夫人Catherine教授在圣地亚哥过暖冬,Vincent教授夫妇不仅聆听笔者的演讲,还特意安排我们参观圣地亚哥动物园和风景名胜,他们和中国孙女一起开心地观赏动物园的异兽珍禽。2016年春季,笔者全家又和专程前往波士顿探望子女的Vincent夫妇聚会,我们一起品味中国菜的美味并讨论全球政经权力的变化,同时商议第五届新媒体学术研究营的关键议题。我们也经常聊起台湾冯建三教授对亚洲世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再次感谢冯建三教授和Graham Murdock教授为本论著书写封底评语。

人生太匆匆,十多年时光转眼就已流逝,所幸雪泥鸿爪,彼此留下合作的印记——《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案例研究》。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厚爱,我们和王焰社长达成共识,把此本专著递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范耀华博士担纲责任编辑,这也是笔者和Vincent Mosco教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些努力。论著仅仅是笔者和Vincent Mosco教授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传播新科技与市场经济对传播产业和社会群体日常生活的深度侵蚀。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前辈学者已经引路在先,晚辈心向往之,不为流风所染,砥砺前行。

曹晋

2017年5月3日

## 参考文献

- ① [英] 齐格蒙·包曼(2006),《工作、消费与新贫》,王志弘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
- ② 曹晋、[英] 格雷姆·默多克(2015),《新媒体、社会性别、市场经济与都市交往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③ 张大业(2010),《全球化下的亚洲跨国企业劳工——抗争的图像》,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 ④ [英] 弗兰克·韦伯斯特(2011),《信息社会理论》,曹晋、梁静、李哲、曹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⑤ [美] 玛丽·E. 加拉格尔(2010),《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郁建兴、肖扬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⑥ Babe, R. (2009),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Lexington Books.
- ⑦ Benkler. Y. (2006), *The Wealth of Nation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 and Freedo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⑧ Colby, D. (2007), "New Media as New Mode of Production?", In McKercher C., Mosco, V. (eds., 2007),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Boston: Lexington Books, pp.193~207.
- ⑨ Dyer-Witheford, N.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⑩ Freeman, R. B. (2006), "Labor market Imbalance: Shortages, or Surpluses, or Fish Stories", Cited from Dean Colby "New Media as New Mode of Production?", in Catherine McKercher, Vincent Mosco (eds., 2007):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Boston: Lexington Books.
- ⑪ Fuchs, C. (2015), *Culture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 ⑫ McKercher, C. & Mosco, V.(2007),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Boston: Lexington Books.

# 目 录

序言 / 1

## 导 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架构 / 1

- 一、政治经济学谱系 / 1
-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焦点 / 6
-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研究图景 / 8

## 第一章 传播产业的商品化 / 19

- 一、内容、受众和劳动 / 19
- 二、网络空间的商品化 / 26

## 第二章 传播产业的空间化 / 36

- 一、社会学的空间理论 / 36
- 二、传播产业的集中 / 37

## 第三章 传播产业的结构化 / 50

- 一、结构主义 / 50
- 二、传播与阶级 / 53
- 三、传播与种族 / 59
- 四、传播与社会性别 / 60

## 第四章 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 / 65

- 一、公共电子服务系统挤压的知识劳工 / 65
- 二、知识劳动外包和国际劳动分工 / 67
- 三、妇女与知识工作 / 70

**第五章 数字民族志：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路径 / 75**

- 一、民族志 / 75
- 二、新媒体、“新”民族志? / 78
- 三、数字民族志案例研究 / 85

**第六章 案例部分 / 90**

- 案例一 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  
——以字幕工作组为例 / 90
- 案例二 “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 / 103
- 案例三 知识女工与中国大陆出版集团的弹性雇佣制度改革 / 114
- 案例四 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 / 134
- 案例五 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  
——论《版权文化——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 / 153
- 案例六 男性时尚杂志与后殖民国家西方资本的扩张 / 157
- 案例七 转型中的中国“苹果迷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 171
- 案例八 中国社交媒体企业营销中的用户劳动和消费主义主体建构：  
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账号为例 / 191

**附录一 《传播与社会的批判研究》序言 / 212**

**附录二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 / 232**

## 导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架构

### 一、政治经济学谱系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脉络 .....

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聚焦权力关系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及参与建构各种资源的生产、分配与消费。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多半是有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至于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489)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降价、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Marx,1976)。

广义上,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生活中控制和生存的研究。前者特指个体以及团体成员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组织和管理,后者指他们如何生产物资,维系社会再生产。控制过程隶属政治性,其编织了共同体内部的关系,而生存过程隶属经济性,关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控制和生存都需要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量。因此,政治经济学将社会变迁与历史转型作为首要研究目标。在此目标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18、19世纪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着眼于全面认识资本主义革命。他们认为,以农业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向商业、制造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最终导致了工业社会的巨变,并引发社会动荡。相比之下,卡尔·马克思重点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审视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的政治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探寻从资本主义转型到社会主义变迁的可能。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政治经济学的源流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其最初指家庭财富的科学,探究人们为了供应欲求和满足欲望所作的努力,而后延展开来,指称共同体的社会习俗、常规和知识(Eatwell, Milgate and Newman, 1987: 907)。18世纪以亚当·斯密为首的道德哲学家开启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序幕,以启蒙运动的两大支柱,即笛卡尔的理性视角和培根的经验主义

理论为基石,将物理学原则应用于分析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现代科学对具体事物的质量、加速度、速率等抽象属性的关注,驱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确定经济恒量的转型,希望以此使得正在经历巨大转变的世界得到稳定的、构成的实体。这与彼时盛行的重农主义中认为经济财富仅仅根植于土地中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则将价值的概念与生产劳动相勾连,从而让其能从与黄金、其他贵金属和土地的简单粗暴的等同中解放出来。这为理论广泛适用于所有形式的产业和贸易提供了支持,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起了一套被认为适用于所有经济活动的抽象变量体系。

根据罗尔(Roll,1942)的论述,古典理论直接来源于三大传统:从洛克的政治哲学中提炼了私利(self-interest)、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和劳动价值理论(labor theory of value)的概念;从重商主义思想中提取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的概念,并使其在劳动价值理论中得到发展;最后从法国重农主义思想中吸取了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的理念,以反对重商主义所提倡的政府干预观点。

追随启蒙传统,古典理论家们主张个人运用理性,实现私利的最大化,推而广之,最终实现社会利益和国家财富的最大化,社会因此被简化为个体的集合,其自身存在和目的被否定,催生出经济民族主义。社会结构被认为是个体交往所产生的自然结果,其对个体选择和社会自由交往的潜在阻碍需要在监管之下运行,政府机构以及国家因此承担了监管职责和权力,但是这种权力易被利用于制造特权。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家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斯图尔特·密尔,他们实现了经济价值与黄金及其他贵金属、土地的剥离,强调生产力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并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阵地。

古典主义理论随后受到了来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抨击。空想家们通过参与社会民主运动,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欧文、圣西门等人致力于以有序、公共的社会替代混乱的自由市场。马克思主义延续了空想社会家的批判,将争论的要点转向平等和社群,但同时反对其为了捍卫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人性观,以道德义愤代替持续的唯物主义分析。沿袭古典主义理论家将劳动作为价值主要来源的观点,马克思创造性地将其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从而发展出一套洞悉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识别出劳动力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异,即剩余价值。增加工作时间(即绝对剥削: absolute exploitation)或者在一定工作时间内增加工作强度(即相对剥削: relative exploitation),都将导致剩余价值增加为资本。马克思同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视角下考察劳动,相比于古典学派忽略资本主义体制内在的贫困化倾向,马克思认为其是一整套空前的社会动态体系,能通过持续的技术革命重组劳动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不只是物质系统,不只是许多实物(机器、工厂、产品等)的体系,而且包含着一系列独特的社会关系。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以商品巨额积累的方式出现”,但是当剥去层层表象,就会发现“全部商品只不过是一定数量的凝结劳动时间(congealed labor-time)”(Marx, 1976: 125~130)。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出卖劳动的生产者并不拥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拥有者、雇佣主即资本家,通过不同的工厂组织生产者,在充斥着商品、劳动、原材料和资本的市场上展开竞争,资本家为了能在竞争中突出重围扩大资本积累,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从而剥削劳动力,这一体系最终导致劳动的商品化、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周期性危机等。

19世纪后半叶,受到以自然科学为模式创造社会科学倾向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国家不应该干预市场,政治和市场应该根据不同的原则分离。所以,政治经济学应分为两个学科,即政治学和经济学。正统经济学家意欲通过对经济学数学方程式模型的建立,来描述生产要素不同组合的结果,使其像物理学一样能对自身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提出概括性的静态解释,从而将政治因素剔除出经济学。当下的主流经济学流派,即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看作是这一学派的发展和延伸。

政治经济学的这一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边沁的启发。边沁认为,快乐和痛苦是讨论道德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而不是宗教或者自然法规,无论后者显现得多么有根据。他提倡设计一种幸福计算法来准确衡量社会福利,并通过社会变革来实现快乐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受此启发,杰文斯将经济学研究定义为对“效用和私利机制”的研究:经济学问题关涉快乐最大化,以最小努力实现最大欲求,以最小量的不可欲生产大量的可欲(1965: 101)。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将难以进行测量的人类需求或权利抛至九霄云外,而将由偏好(preferences)表达的欲求(wants)——即在资本、劳动力、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上可确定、可衡量的选择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内涵。同时,经济学对商品的绝对效用给予相对较少的关注,它更感兴趣的是商品的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即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消费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额外满足程度。1890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开始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被奉为经典,书中贯串以下两个概念:第一,经济学家关注社会秩序,即关注均质状态中各种力量的描述,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确定并描述各经济单位的属性,交代它们的关系如何在财货世界中维持平衡;第二,表达了“自然从不突变”的观点,经济宇宙与牛顿的宇宙相同,由少量的、点滴增长的变化组合而成,因此外部环境的各种制度安排均理所应当,这同时意味着经济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的话,必须是以数理逻辑支撑的硬科学。为此,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特征都被阉割,貌似科学的数理模型与社会历史脉络相割裂,俨然丧失对社会整体性的分析,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志趣限定在一般的均衡类型中。“经得起验证的经济学”服务于商业社会追求利润和效益的道德律令,以价值无涉的中立客观面目自居科学研究的典范,捍卫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否定社会变革的可能和必须。



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政治谱系中占据了中心和中间偏右的位置。在 20 世纪早期,这一学派遭受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攻击,此后,通过统计分析和经济度量模型的增长再次掌握了强有力的对抗工具。位于中间的是凯恩斯主义,它认为市场活动不必然产生商业循环,因此不一定会提供适当讯号作为商业决策的参考;主张政府采取财税政策,表现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刺激投资。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间偏右的货币学派经济学家扩大了其在经济学中的影响力,反对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阐述经济荣枯的基石是货币政策,提倡通过控制通货膨胀来进行经济调节。

#### 另类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盘踞在政治谱系中中间偏右的位置,而另类经济学则占据了政治谱系中剩余的空间。

新保守主义又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主流经济学在全力发展经济方面过于谨慎,试图将经济分析的模型延伸到所有形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它们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期望学派、实证政治经济学等。其中斯蒂格勒等学者认为,规则管理应被视为一种组织的市场,而政府为了最大化收租利益会增加规则的数量和范围,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政府是规则最大的受益者,因此要限制政府对竞争行为的限制,提倡“小政府”或者政府不干预市场自由竞争,主张自由贸易、推行减免税收、削减社会福利、反对积极平权措施。这支新保守主义势力开始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并于 20 世纪 70 年代成型,共和党作为主要推崇党派,在已故总统罗纳德·里根、前任总统老布什及小布什执政期间,在外交政策上均推崇“新保守主义”,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外交政策上也属于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派表现为社团主义(Corporatism)观点。在社团主义制度里,许多未经过选举的组织实体掌控了决策的过程。这些社团主义的代表团与一般的商业公司或法人组织并不不同,而是构成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中心思想——精英政治。他们认为保守主义唾弃的政治,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掌控。公共政策理论希望重新收复政治的失地,但是由于其倡导个人主义和契约主义,成效甚微。社团主义式保守主义,抵制公共选择理论对“制造市场”的偏好,认为其体现了对固有道德的入侵,因而它们希望依赖精英标准重塑传统社会实践,确定公民道德,最终实现政治干预。取代个人主义的方案,就是将社会视为一个由许多社群组合而成的集合体,这些社群有自己的有机规范秩序,经济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种。

位于谱系当中的是制度经济学。也就是说制度经济学是处于中庸地位的“左派”的主要异端立场,吸收了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取向及其论述。前者不同于新古典主义者,主张经济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市场——是主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主要动力。制度经济学的